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的確納入了不少新的內容，激起國內外學界對於中國新改革時代的極大期待。我刊「二十一世紀評論」專欄歡迎海內外作者，就中國新改革的前景，踴躍撰文討論。

——編者

內部還是外部效應建設？

倪玉珍的〈民粹主義民主還是多元主義民主？——托克維爾的啟示〉（《二十一世紀》2013年12月號）一文主要以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為導引，通過與美國的比較研究，考察了法蘭西民主風雨飄搖的內在原因。在作者看來，一個國家是否擁有健全的社會中間團體是保障該國民主制度鞏固並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一論斷同樣適用於當代中國社會。

筆者基本贊同上述觀點，並在此基礎上追問：對於當代中國，我們到底需要甚麼樣的社會中間團體？按照王紹光的說法，我們既可以強調社團的外部效應，又可以突出它的內部效應。然而，在社團不獨立於國家控制時，我們是很難指望其發揮政治性外部效應（即平衡、制約國家權力）的，而這恰恰是當代中國社團組織的現狀。因此，倪文所主張推進的社會中間團體建設，想必是內部效應（即培育公民民主素質）意義上的建設。

這種建設思路也得到了政治高層的部分認可。在剛剛召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開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提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口號。「治理」（governance）不同於統治或管理，這種模式拋棄了政府萬能的神話，而注重一種建立在國家與市民社會合作基礎上的多元主體共治。根據這種理解，社會中間團體將在未來的國家治理體系建設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在新歷史背景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或許在於，通過社會中間團體的內部效應建設，在國家與市民社會間是否會產生良好的互動？進而，由內部效應所達致的社會資本是否會催發出諸多的社團外部效應這樣的未意圖後果？

丁軼 大連

2013.12.16

「人民社會」的正本清源

在經濟學的中國模式獨特論甚囂塵上時，政治學的中國道路優越論也紛紛出籠。胡鞍鋼拋出「人民社會」優於「公民社會」的論調，自會引來種種駁議。段德敏的〈人民社會與公民社會：誰的社會？〉（《二十一世紀》2013年12月號）一文與其他駁議不同，它不是就事

論事地與胡鞍鋼正面爭辯，而是正本清源，從「人民」、「人民意志」、「人民社會」的理論淵源着手，分析「人民」與「社會」之間、「全體人民」與「人民代表」之間隱含的巨大張力。

作者所追溯的理論源流分別是馬克思（Karl Marx）、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和勒弗（Claude Lefort），顯然是別具匠心的。馬克思是科學社會主義理念和運動的首倡者，但卻對「人民主權」的普遍性作了深刻的批判。托洛茨基曾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重要領導人，但他卻對官僚階層與人民意志的矛盾作了入木三分的揭示。而原來較少被學界關注的法國政治哲學家勒弗，則依托克維爾的思想傳統，將「人民意志」被表達和被代表的不穩定性作了獨特的分析。對勒弗這些思想的挖掘，是段文的一個亮點所在。

通過作者的理論清源工作，使我們對「人民社會」可能隱含的種種陷阱有了清醒的認識。不過，段文的一個不足之處在於他在對人民思想的正本清源中似乎忽略了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重要位置。盧梭在《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中分析了個人意志與「公意」之間的複雜關係，

他所闡發的「公意」概念對後來的「人民」概念有直接的影響。

應星 北京
2013.12.17

中國如何才能再整合？

張靜的〈兩種社會整合的紐帶：中國變革的文化與政治之路〉（《二十一世紀》2013年12月號）提到一個重要概念：「整合」。踏入二十一世紀，中國面臨重新融入國際經濟秩序，重建市場經濟，肯定私有產權的全新局面，使得曾在二十世紀中葉整合全民族的一系列意識形態處於十分尷尬的位置。

張靜首先質疑重新回向中國文化傳統以整合全社會的觀點。中國人在傳統社會中所依賴的「文化認同紐帶」雖然維繫了文化血脈，但在現實中政府和民眾的基本權益保護之間的關聯卻非常微弱。傳統文化下的整合基於文化、日常行為守則和狹隘的地方和家族利益，而不是現代的公共法律和非個人化的權益保障，這既造成個體國民和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疏離，也由於公權和私權不能得到清晰的分界，使公共職位常常成為私人發財的工具。

對比文化整合的路徑，張靜提出建立「政治認同紐帶」。她顯然以現代西方主流政治制度作為參考，強調國家作為公權力組織與國民之間存在「共享利益」，並指出國民的認同感只能在這一基礎上重建。國家職責是成為公民個人和財產安全的保護者。只有建立超越特殊主義環境和關係、具有穩定性和規範性的法制秩序，才能是國民建立政治認同、實現真正有效的整合的途徑。

張靜以現代自由民主理論回應了文化保守主義觀點，指出了一種較文化復古更具優勢的政治再整合路徑。其實傳統文化的問題更在於其賦予上層統治者以絕對的政治和經濟權威。傳統文化中國家的同一性和集中不可不察。另外，在回應有關宗教的整合力時，張靜似應更直接地闡述中國並不存在一個全民接受的主流宗教信仰這一事實，這使中國完全不同於老撾或緬甸這樣的國家。漢民族的宗教信仰偏弱，而多民族、多宗教並存的現狀更使基於「政治認同紐帶」重建全社會整合顯得更為合理。事實上，「文化認同」論者還忽視了一個問題，即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儒家文化傳統和漢族的歷史記憶並不被其他民族認同，從這一角度看，以法制、利益、權益為核心的「政治認同紐帶」和現代的國家—民眾關係的確是中國社會再整合的前提。

伍國 美國
2013.12.17

陳獨秀的困境

早期許多共產黨人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都經歷過自由主義或是無政府主義的洗禮，但最後卻投身側重威權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共產革命。中共黨人是如何實現從自由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又是如何處理自由與威權、個人與集體、國家與階級、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推動五四知識青年將目光從西方轉到東方，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以往論者多

從政治層面展開研究。徐偉的〈陳獨秀的「大我主義」及其思想困境〉（《二十一世紀》2013年12月號）一文，以陳獨秀為個案，將其人生哲學與政治思想聯繫起來探討這一問題，指出在陳改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其「大我」觀起到了關鍵作用。新文化運動初期陳獨秀所追求的個人自由，在追求「大我」的過程中逐漸消失，最終，「個人」淹沒在「國家」與「階級」當中。

頗為弔詭的是，陳獨秀晚年又回到了自由民主的立場。但並非簡單的回歸，而是思想的昇華。對於民主，他有了重新認識，認為民主是「超時代」、「超階級」的，是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級的旗幟。他認為源自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黨的獨裁和領袖獨裁，只有承認反對派的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

黃金鳳 廣州
2013.12.25

致謝

《二十一世紀》謹在此向2013年曾協助評審投稿的專家學者致以謝意：王正緒、方維規、任劍濤、伍國、吳縛龍、宋耕、李金銓、李若建、李家翹、沈志華、周保松、周濂、林蘊暉、郁建興、高全喜、張千帆、張光、張健、張隆溪、張靜、陳永發、馮筱才、楊伯淑、楊奎松、楊貞德、楊繼繩、趙鼎新、趙穗生、劉青峰、潘學方、鄧小虎、應星、羅志田、蘇陽（按筆畫序）。